

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  
——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

张海英◎著

ZOU XIANG DA ZHONG DE JI RAN ZHI SHU  
MING QING SHI QI DE SHANG SHU YAN 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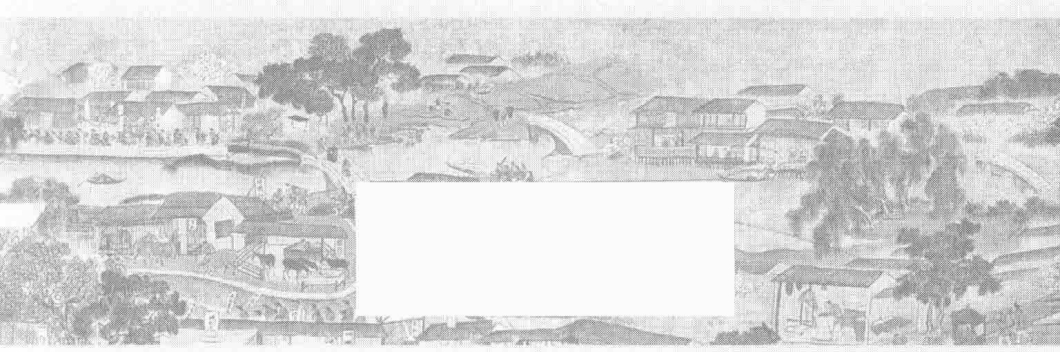


# 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

——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

张海英◎著

ZOU XIANG DA ZHONG DE JI RAN ZHI SHU  
MING QING SHI QI DE SHANG SHU YAN JIU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张海英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9.7

ISBN 978-7-101-13226-7

I.走… II.张… III.商业管理-图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F7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3898号

- 
- |      |   |
|------|---|
| 书 名  | 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   |
| 著 者  | 张海英   |
| 责任编辑 | 贾雪飞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br>(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br><a href="http://www.zhbc.com.cn">http://www.zhbc.com.cn</a><br>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9年7月北京第1版<br>201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毫米 1/32<br>印张15 $\frac{1}{8}$ 插页2 字数340千字  |
| 印 数  | 1-4000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3226-7  |
| 定 价  | 48.00元  |
-

# 市场经济中商业文化的万花筒

樊树志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把这四百年的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涉及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即衣食住行；第二个层次是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与农村劳动、摊贩、店铺、作坊、交易所、银行、市场相联系；第三个层次是资本主义——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为了对比西欧与中国，说明市场经济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他还用大量篇幅描述中国的大米生产、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他把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国家的干涉与阻挠，并以中国商人在国外（例如南洋群岛）蓬勃地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反证。

布罗代尔的观点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文版序言中说，他很赞同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做出的区别：18世纪的清代中国肯定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资本主义”。

黄仁宇在《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中，总结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时说：“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主题最有贡献的学者无疑是弗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我特别欣赏他提出许多一针见

血的总论,其中之一是‘资本主义只有和国家合而为一时才能成功,这时资本主义就等于国家’。这句话就像锋利的刀刃,一举切开大部头的历史。”他在《万历十五年》自序中说:“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 C - M - 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他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我很赞成上述三位前辈的见解。明清时代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现在似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至于有没有市场经济,恐怕还有不同意见吧!我认为,至少在晚明的江南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市场经济。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中说:“农村工业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以至伊懋可(Mark Elvin)怀疑明清中国的农村是否已经‘过度工业化’和‘过度商业化’了。这些都使人相信明清中国(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也出现了早期工业化。”与这种早期工业化相适应的就是市场经济。

品牌与商标意识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棉纺织业蓬勃发展,产品远销海内外,声誉鹊起,逐渐形成若干优质品牌与商标。一些无良商人非法经营假冒品牌与商标,牟取暴

利,这在明末清初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毫无疑问,这便是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产物。顺治十六年(1659)四月,松江知府在衙门口刻石立碑——《苏松两府为禁布牙假冒布号告示碑》,就牙行奸商(即所谓“奸牙”)沈青臣等假冒松江金三阳字号品牌一事做出裁决,在衙门口公示,“商贾贸易布匹,惟凭字号识认,以昭信义”,“金三阳字号历年已久,乃沈青臣勾同别商,射利假冒”,因此,宣布禁止这种“奸徒伎俩”,“自禁之后,各照本记号印刷贸易,不许仍前构通混冒”。由于松江优质棉布销路十分兴旺,奸商假冒活动禁而不止,康熙四十二年(1703)、乾隆元年(1736)重申禁令,说明假冒品牌商标之风愈演愈烈。显然,这是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

张海英教授的新著《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从商书的角度向人们展示市场经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让人们看到市场经济中商业文化的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颠覆了先前对于商人与商业的固有偏见。

兴起于晚明,盛行于清代的商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明清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商书的种类繁多,一类是为初入商海者提供的了解市场与贸易的入门须知,如《生意世事初阶》《贸易须知》《生意经络》等,主要面向坐贾。另一类主要面向行商,为携带巨资往返于产地与市场的商人团体(亦即商帮),提示路程导引以及注意事项,如《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士商类要·路程图引》《示我周行》等。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商书研究的视角扩大到与商业有关的其他文献。一类是日用类书(亦即所谓“万宝全书”)中有关商业的部分,如《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一书中的“商旅门”“民用门”等,《新刻全

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中的“算法门”“体式门”等。另一类是有关商业的手抄本。足迹遍天下的徽商,经营典当、钱庄、布业、木业、盐业等各行各业,既有商业实践,又有文化修养,编撰了数量可观的商书。这些商书大多没有刊刻出版,仅作为手抄本流传于世。书中记录了水陆路程、市场信息、买卖规则、行业规范、风土人情、经营技巧、商业道德等,其研究价值或许为正式出版物所不及。这一点已经由王振忠教授的系列研究所证实。

张海英教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对所能搜集到的六十多种商书作整体性的研究,涉及商书出现与流布的社会背景,商书与商业政策、商业文化的关系,商书所反映的商业伦理与商人意识,商书所反映的市场经济与经商实践等。对我而言,阅读这本书稿所获得的收获,也是多方面的。

商人群体的独立精神与主体意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愈来愈凸显,从一个侧面向人们昭示,历史已经跨入了一个新时代。诚如作者所说:“从明中叶开始,社会各阶层对商人和从事商业活动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士人们讲究实际,并不以‘谋利事功’为可耻。在徽州,人们更把商贾说成是徽州的第一等生业,徽州许多人‘执技艺或负贩就食他郡’,‘左儒右贾,喜厚利而薄名高’,‘直以九章当六籍’。以至于民俗中‘以商贾为第一生业,科第反在次着’。总之,民间社会思潮及价值观念对商人和经商的宽容,使得社会上弃儒从商、弃农从商成为常态,从商者愈来愈众,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商帮的发展。”“商帮的出现,使得明清时期的商书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阅读群体,他们的需要成为商书的一个重要的市场需求。以市场导向为主要宗旨的书商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商机,纷纷编撰、出版了许多关于经商

经验知识的小册子以及程图路引等，于是专门讲授各类从商之道及专业知识的商书应运而生。”

商帮的经济实力令人刮目相看。明末清初松江府上海县人叶梦珠说，徽州商人、陕西商人、闽粤商人携带巨资前来收购优质棉布，是棉布业市场日趋繁荣的经济动力。“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丝绸业市场更是如此，闻名海内外的湖丝集散地南浔镇，“一日贸易数万金”，“闾阎填噎俚佻忙，一榜大书丝经行。就中分列京广庄，毕集南粤金陵商”。以濮绸闻名的濮院镇，“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麇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绫绸集散中心盛泽镇，“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联袂，如一都会”。如此巨额的长途贩运，其风险可想而知。商书除了提示便捷的路径，还会告诫沿途注意事项。

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天下)水陆路程》第七卷，专门指引最为繁忙的苏州至松江、苏州至湖州、嘉兴至松江等水运路程，小标题是“苏松二府至各处水”，下面有两行小字夹注：“路虽多迂，布客不可少也。”意思是说，这条水路是棉布客商的必经之路，除了标明自苏州至吴江、平望、王江泾等各处码头的距离，还特地说明沿途的风险：“嘉兴至松江，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至上海，由泖湖东去黄浦，为外河，有潮、盗之防”；“松江至苏州，由嘉定、太仓、昆山而去，无风、盗之忧。上海沙船，怕风防潮。南翔地高，河曲水少，船不宜大。过客无风、盗之念，铺家有白日路来强盗之防。”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透露这样的信息：当年苏州、松江一带各地商帮云集，络绎不绝，源源不断地把这里的优质

产品运销到全国各地,业务繁忙。《水陆路程》作为商书,责无旁贷地提醒客商,注意选择安全的行商途径。毫无疑问,这是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

当时的市场经济规模不可小觑,吴中孚《商贾便览》记载了20个省252个府州总共1800多种商品,其中包括140多种新品种,还记载了日本、高丽、安息、波斯、缅甸、交趾以及大小西洋诸国的70多种商品。要应对如此庞大的市场,如此巨额的物流,没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势必寸步难行,商书不可或缺的价值由此显露无疑。

隆庆元年(1567),朝廷宣布取消海禁政策,准许百姓出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政府在东南沿海的港口设置海关,征收进出口税,使得私贩贸易转化为公贩贸易,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对外开放的结果是对外贸易的高潮,中国被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在贸易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等国始终处于逆差(入超)的地位,中国始终处于顺差(出超)的地位。于是乎,源源不断的白银货币,随着贸易商船的到来而流入中国。在货币的银本位时代,这种白银货币是可以在中国市场流通的,这使得中国商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识别这些外国银币的真伪与成色(含银量),也成为商书无法回避的难题。《商贾便览》的“辨银要谱”一节,有《辨银则例》《辨银名色》《辨银增要》等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还介绍了“交趾、红毛等国所出之洋钱(西洋银元)”。《贸易须知》提醒商人:“近来江浙等省通用洋钿(即洋钱),有光毛真假之分,与看银之法同而不同。此系业业专门,外行未必习此。凡收洋钱,务请内教人仔细看明,切勿大意,致有吃亏。洋价照市,或申或否;进出找钱,看货价之多寡,总宜细心合算,勿使有错,转受买主批评。”商书与时俱进地为商人们打开了国际

眼界,许多商人成为外贸人才,商书功不可没。

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商人群体为了立于不败之地,日益注重商业伦理,讲求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诚实无欺、重恩守信,为传统道德赋予了时代特色。这是商书的共同特征,也是商书得以流传数百年的内在因素。《客商一览醒迷》说:“财富必由勤苦而后得,得之必节俭而后丰”;“处人和则无争,家和则治强,四海和则万邦宁”;“钱财物业,来之有道。义所当得者,必安享永远。若剥削贫穷,蒙昧良善,智术巧取,贪嗜非义,虽得之,亦守之不坚。”《士商类要》《商贾便览》等书都提及买卖交易要讲诚信:“好歹莫瞒牙佞,交易要自酌量”,“货之精粗,实告经纪,使彼裁夺售卖。若昧而不言,希图侥幸,恐自误也。”《贸易须知》说:“商亦有道,敦信义,重然诺,习勤劳,尚节俭。此四者,士、农、工皆然,而商则尤贵,守则勿失。”这样的商业伦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丙申年春节书于寓所

# 目 录

市场经济中商业文化的万花筒 ..... 樊树志 1

导 言 ..... 1

## 上 编 明清商书的基本状况

第一章 明清商书的主要种类、特点与文献价值 ..... 27

一、明清商书的种类 ..... 27

二、明清商书的特点 ..... 36

三、明清商书的文献价值 ..... 40

第二章 明清商书的刊行与传承 ..... 75

一、商书刊印的变化：以《生意世事初阶》《贸易须知》

《生意经略》《燕语生意筋络》为例 ..... 75

二、商书的传承与变化：以《一统路程图记》《土商类要·路程图

引》《示我周行》为中心 ..... 93

## 中 编 明清商书的内容透视

第三章	“天下被网罗”：商书所反映的市场经济 .....	151
一、商路网络的发展——以江南为中心 .....	152	
二、商品流通的变化 .....	196	
第四章	“取财以道，利己利人乃见本”：商书所表现的经商实践 .....	213
一、“继绍先人，训成后裔”：商人的职业教育 .....	213	
二、清代坐贾的经营理念 .....	257	
第五章	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社会观念的变迁与商业文化的构建 .....	274
一、关于“重本抑末”：政策源流的思考 .....	274	
二、“新四民”论的兴起：明清的变革 .....	280	
三、商书中的商业伦理与商人意识 .....	295	

## 下 编 明清“商书现象”的时代背景

第六章	“商业革命”：商业化、商帮与大众教育 .....	319
一、“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化与市场经济 .....	320	
二、商帮：地域性商人组织的兴起 .....	329	
三、从精英到庶民：大众教育的普及 .....	334	

第七章	“出版革命”与商书	340
一、	出版印刷业的变化	341
二、	图书市场的兴旺	348
三、	民间书坊与商书的刊印	353
第八章	“商人已富贵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360
一、	“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社会思潮的转变	361
二、	“士商渗透”：制度环境的变迁	377
余 论	全球史视野中的明清商书	398
主要征引书目		427
后 记		469

# 导 言

## 商书的定义与渊源

商书，顾名思义为介绍从商经验、传授经商技巧之书。中国古代的商业发展历史悠久，但是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工商食官”，工商业为王室、公室、官府垄断，没有私人商业，也尚未出现关于经商知识的文献。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很多自由经商的商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数十位善于经营并致富的各类人等，其中既有著名的大商人如子贡、范蠡和白圭，也有靠盗墓、赌博、行走叫卖、贩卖油脂等发家的田叔、桓发、雍乐成、雍伯之辈。他们活跃于商界，其经商经验也在商人中传播，相关记载为我们留存了这一时期的经商思想。

子贡名端木赐，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和孔门十哲之一。他精于从商之道，往来于曹、鲁两国之间经商，富致千金，时称“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sup>①</sup>。子

---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4，点校本，第3927页。现存文献中尚未发现专门记载子贡经商及其思想的典籍，其经商事迹主要依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

贡为当时巨富，孔子周游列国都是靠他资助的，他亦被视为“儒商鼻祖”。

范蠡是越国大臣，曾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兴越。他深知勾践“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担心“兔死狗烹”之祸，于是功成身退，化名鸱夷子皮，去齐国经商。他致富有术，提出随机应变，与时逐利，“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经商之道，堪称中国历史上弃政从商的先驱，开创了个人经商致富的先河。《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他最后定居在陶邑（今山东定陶），自号陶朱公，成为几千年来成功商人的楷模。范蠡还辑录了他的老师计然关于经商的言论，参以自己的见解，写成《计然书》。<sup>①</sup> 后来人们又根据

---

① 《计然书》也称《计然策》。“计然”究竟是人名还是书名，学界说法不一。东汉以来，许多著作都认为计然确有其人，并称计然是范蠡的老师。《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但这里，并未明确说计然是一个人。班固《汉书》的《古今人名表》里列有计然之名，肯定计然是一个人，此后从此说者遂多。计然在《吴越春秋》又作“计碗”，《越绝书》作“计倪”，说是越王勾践的大夫，且“年少官卑”。三国时魏人孟康也说计然是越臣。唐颜师古、张守节、马总等均认为计然是人名。《汉书》的注者颜师古说：“计然者，濮上人也……尝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书则有《万物录》，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裴驷《史记集解》云：“徐广曰：‘计然者，范蠡之师也’。”马总《意林》引《范子》十二卷，并说：“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其志沉沉，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此外，《新唐书·艺文志三》有“范子计然”，说是“范蠡问，计然答”（今有辑本）。还有《计然万物录》亦以计然为人名。总之，多数著述都认为计然是人名。晋人蔡谟认为，“计然”不是人名，而是范蠡所著书篇名；钱穆在其《先秦诸子系年》中亦考证说计然纯属于虚乌有。胡奇窗在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把关于“计然”的争议做了详细梳理，而他本人则倾向把（转下页）

范蠡的经商思想,辑有《陶朱公商训》(又称《陶朱公生意经》《陶朱公商经》),<sup>①</sup>成为后世商家的经营宝典。

白圭是战国时人,曾在魏国为相。他擅长商业致富,其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贸易原则为后人称道,他也是后世商人所崇奉的祖师,号称“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sup>②</sup>

子贡、范蠡、白圭等人对中国古代商人影响很大,后世人们往往把与从商事业及与之相关的经营计谋称为“计然之策”“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白圭之术”。其中,专门整理经商之术且留存下来的书以《计然书》为最早。因此,它可被视为中国古代商书的渊源。

但无论是《计然书》还是《陶朱公商训》,均是后人口耳相授留传下来的。在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多次改写,而且散见于历史典籍之中,因此不能被视为先秦原始文献。这些著作多为一些警句的集成,其流传也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因此尚非全面传授经商知识的出版物。全面传授经商知识的出版物即商书,是明后期才开始出现的。

本书所说的“商书”,指的是明清时期由商人或民间书坊编撰出版,以阐述商业规范、商业道德、商业经营理念,传授经商技巧,介绍商品知识、行业特点及行旅指南等为主要内容,以商人为主要阅读群

---

(接上页) 计然的言论当作范蠡的思想看待,认为“计然”是书名,而非人名。详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第189—190页。

① 《陶朱公商训》的具体成书年代尚不清楚,从其行文风格看,成书时间似较晚。书中的诸多训诫流传下来,在后世的商书中多有体现。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927页。

体的读物。学界亦称之为商业书、商人书。这类图书在明后期开始大量出现并得以广泛刊行，清代踵事增华，商书不仅种类增多，而且发行量剧增。对于这种现象，本书称为“商书现象”。

## 商书研究的重要性

就其性质而言，明清商书是应明清时期商业发展之需要而产生，是商业经营活动与经营理念的经验总结。明清商书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的商人对于经商知识的获取，已不再满足于父子相传或师徒相授的传统形式，而是开始注重商业知识的系统累积与传播，重视从职业教育的角度培养子弟生徒。大量商书公开刊印示知世人，也说明其时商书的内容已成为社会公认的有用知识，开始为公众所接受。因此，研究明清商书不仅可以探讨当时商人自身的思想意识与经营理念，也可以从中观察其时社会的思潮动态。

为数众多的商书，所涉内容十分丰富。内中所载，有许多是官方文书中难以寻觅的民间实用知识，有些著作所言更是编纂者的亲身经历，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明清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商书如《士商类要》《一统路程图记》和《商贾便览》等，莫不如此。将这些商书与官方文书及其他文献相互参证，将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商业经济、交通及商业思想文化的全貌。

明清商书中的商编水陆行程书，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全国商贸线路、各地商品生产情况、市场流通特点，以及各地风土人情、沿途食宿条件、治安状况、车船运费、关税征税、南北客商、牙行活动、航道通